

从《上游集》看抗战时期顾颉刚的 学术活动及思想

刘俐娜

内容提要 本文从民族复兴思想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和顾颉刚整理古籍的计划和实践、探索史学普及和学术通俗化之路、重视边疆学术研究和考察四个方面梳理了《上游集》反映出的抗战时期顾颉刚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思想,揭示了这些学术活动背后隐含的顾颉刚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切之情。

关键词 顾颉刚 抗战时期 学术活动

对于顾颉刚在抗战时期的学术活动,学界已有所论及,譬如,他创办通俗读物、考察西北、主编《文史杂志》等。^①不久前,在顾潮^②处看到了1949年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的顾颉刚文集——《上游集》。“上游”者,黄河上游、长江上游之谓也。书中收录他“流寓西北、西南时所作短文”,反映了1938年至1945年间他的生活和学术活动,为我们了解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活动及其学术思想提供了帮助。

—

首先,《上游集》再现了抗战时期顾颉刚的主要生活与工作经

① 如汪受宽的《以救国为自任的顾颉刚甘肃之行》,《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田亮的《顾颉刚抗战期间的学术活动述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等。

② 顾颉刚之女。

历,记录了他在战时关于民族复兴和文化建设的主张。

七七事变后,因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顾颉刚被迫离开北平,随后远赴西北进行考察,1938年10月至云南大学教授“经学史”、“中国上古史”,次年赴成都出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1942年就任中央大学专任教授和出版部主任,1944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这期间顾颉刚先后出任了中国边疆学会理事长、《文史杂志》副主编、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和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大中国图书公司编辑所所长。同时承担了一些社会事务,如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在西北西南的生活持续了8年之久。

这8年中,顾颉刚奔波迁徙,忙于繁杂工作和诸多事务,无法专心治学。他后来写道:“溯自对日抗战以来,流离转徙者凡九载,初跋涉于甘青,继驰驱于滇蜀,以工作力最强之年龄长消耗于避兵避弹蝓蟥震荡之中,数月一迁,靡知所届,诸所谋虑,百不一成;又复故庐残破,东望兴嗟,骨肉凋零,悲怆无极;加以币值日贬,饔殍不继,兼职三四,托命舟车,倚装而书,无案可伏;此与前二十年之书城生活截然异趋,岂尚能撰写文字哉!徒以朋儕不弃,频来督促,稍得余闲,便操弄柔翰,以是亦略有成篇。然而四壁洞然,资料空乏,方寸既乱,思理难综,每彷徨不能下笔;或积稿及半矣,事来掣夺,搁置多日,遂不能成;或一文成矣,而一经流动,为人轻掷,或友人携去,未留副本有若弃婴道路,更无见期。凡此怅惘,讵可殚言。”^①这正是他自己所谓战争年代的“惨痛”人生经历。

八年抗战在顾颉刚生命中的痕迹是至深的。他在五四时期因对旧古史系统的大胆质疑而崭露头角,随后在古史的考辨和古书的整理方面都有建树。抗战爆发时他45岁,正值人生的壮年,也

^① 顾颉刚:《上游集·序》,1949年合众图书馆油印本。

是他“工作力最强”，在学术上突飞猛进的年华，但严酷战争剥夺了他安心治学的环境和自由。这期间他还连续遭受了丧父丧妻之痛。尽管如此，他没有忘记学者的职责，没有中断思考和笔耕，留下了《西北考察日记》、《上古史讲义》、《浪口村随笔》^①等。

《上游集》是战后编辑成书的，收入文章40篇，分为论学术、边疆、政治教育和杂文4编，5万余字。其中有为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书的序跋，会议的提案和报告，以及纪念性文字等，大多写于抗战期间。文集中虽没有长篇大论，甚至还有一些是朋友督促之下的急就篇，其论学部分还大都是一些学术活动的计划书、说明书等，但毕竟是在最艰苦之时留下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战争时期顾颉刚在学术上的探索轨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

《上游集》字数虽不多，涉及的领域却较广，表现了顾颉刚对史学、传统文化、边疆事务，乃至政治、教育等问题的深切关注，字里行间透出了一位学者的拳拳报国之心，流露出牵挂国家学术和文化建设的衷情。

抗战期间，顾颉刚的身份不再是单纯的学者、教授，作为一位史学家，他被推上了社会活动的舞台。从被聘作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到当选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从组织中国边疆学会，到涉足商界主持出版公司，这些工作添加了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为他本已繁忙的生活更增添了一分忙碌。这一特点在《上游集》中有明显的体现。文集所收篇目类别庞杂，从论学、政府提案和报告到种种学术计划、说明书，以及随笔、启示等等，反映了顾颉刚的多重身份、角色。教授的职责，使他不能放下对古史的研究；编辑的工作督促他去精心思考把学术刊物办得更好更能发挥作用；出版

^① 在云南大学时的读书笔记。

工作使他有机会在追求学术深入的基础上尝试通俗学术读物的出版;而国民参议员的责任又要求他思考国家文化建设和发展,以及教育等问题。

由专心学术研究到承担一些社会事务,这种身份的变化使顾颉刚有了在学术研究圈子之外审视学术的视角。也正是从整个抗战及建设国家和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学术发展的前途,使他在思想和学术研究上都有了相应的调整 and 变化。而这种调整变化则是受到当时流行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建设主张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通过对历史的观察得出结论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机运”,“是中国的复兴时期。”^①这是当时参加抗战的无论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认同的结论,是社会思潮的主流。

顾颉刚也不例外。文集中收入的他为1942年《中央日报·增刊》撰写的《三十一年元旦致词》中写道:抗日战争是中国“解除百余年来重困之桎梏,复此自由之身,跻乎昌隆之域,此绝难逢之时会,而竟于吾辈九死一生中逢之,当作如何之慰藉”。“今兹之战,外以提高我国格,内以重树我国人之自信力,知国于天地必有其自存之道,非随人俯仰可以苟焉而已。”^②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契机,当然也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作为知名学者,顾颉刚自觉地把民族复兴和文化建设当作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并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整体的思考。他在《元旦致词》中回溯了中国文化的发

① 参见王桧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论中国的复兴》,提交1995年“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据王桧林先生考察:“那时,中国政党、政界要人、思想家、学人、舆论界,发表此种见解和言论的人非常之多。”

② 《三十一年元旦致词》,《上游集》,第23至24页。

展,对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历史进行了探讨。他说:“自远古以迄近世,我国巍然为东亚惟一大邦,积累粲然之文化,独立雄视,自命曰‘天朝’,诚天朝也。及乎清代,而强盛于我者乃日多;海道大通,强盛于我者又日蒞。惟时他人之坚甲利兵,我已瞠乎后矣,而国人昧于大势,恃天朝慢人自若。虚声不可以夺实力,受挫受侮,至于再三,危亡临目睫,始惶惶变曩日之骄蹇,弃掷其自信以托命于他人,人曰左则左,人曰右则右,若影与响,三四十年间,凡论政治与教化者,无不惟远邦之辙迹是依焉;至于我固有之文化,历史之传统,则屏而去之,以为皆无预于人事。是犹轮蹄大树生于沃土,而一旦违其天性迁植之于沙丘,有不萎绝者乎!”^①近代国人由蒙昧傲慢到弃自信以托命于是摒弃固有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过程,而摒弃文化历史传统来谈建设国家,就如将大树从沃土迁于沙丘。他主张:“立国于今日,必当有今日之建设,所以训教其人民者又必当为今日之文化。所谓今日之建设与文化者,即为斟酌古今,陶融人我,以合于此时此地之需求,既非随人,亦非专己,而经选择与创造者也。”^②这也就是说,国家要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国民教育应当以现代文化为内容,而现代的文化需要以独立而不专断的态度、认真选择和创造的精神,熔炼古今中外文化而成之。顾颉刚的这个文化建设观念与战前,也就是 1935 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和 1934 年成立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文化主张有相近之处。^③自“本位文化建设”提出时起,经过五六年思想的发展,历史背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大敌当前使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扬问题受到普遍的关注,这使国内思想界对文化的普

① 《三十一年元旦致词》,《上游集》,第 23 页。

② 《三十一年元旦致词》,《上游集》,第 23 页。

③ 参看刘俐娜《中国民国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7—172 页。

遍看法与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反省的文化思潮有了很大的不同。

但顾颉刚的文化建设观与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建设观念仍有区别。五四时期曾以反封建传统文化代表形象出现的顾颉刚此时也能够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不分你我的加以认真的选择,建设一种“合于此时此地”的有创造性的新文化。同时,作为历史学者的顾颉刚强调了对历史传统的“斟酌”“陶融”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意义,特别指出文化的建设一定要“既非随人,亦非专己”。这使他的文化建设观在吸收社会思想的同时,表现出显著的特点。顾颉刚不仅如此认识文化重建的问题,而且在学术研究中积极地实践这一观点。事实上,民族复兴和文化建设是抗战时期顾颉刚学术思想的中心内容。《上游集》反映的顾颉刚所从事的主要学术活动,如组织整理《十三经》、倡导对边疆进行学术考察,以及关注学术普及和史学发展等,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战局较前趋于稳定,国民政府的战时建设工作提上日程。4月,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7月设立《十三经注疏》整理处。次年6月,国立编译馆编刊处主持编辑《十三经新疏》。顾颉刚在此期间相继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十三经注疏》整理处主任,并出席编译馆会议,还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与蒋谈整理中国古籍的问题。《上游集》中涉及整理传统古籍的3篇文章《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拟刊印〈十三经新疏〉缘起》、《〈唐以前文类编〉旨趣书》即为此期所做。

《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是顾颉刚担任整理处主任伊始即做出的工作计划,其中对工作开始时间、具体的整理方法、办公地点、工作人员、所需经费等,一一作了详细的安排。其步骤计划为:“工作之第一步为标点校勘”,需5年完工;“第二步为编辑索引及图表”,一年内完工。索引分以“字”和“词语”分类两种方便使用;“第三步为编辑《经学辞典》”,“综合注疏以外各时代之经学书”为之。^①从这个计划看,顾颉刚对整理工作十分重视。如果真能对《十三经注疏》作这么一番整理,那真是一项有意义的大工程。他把这一计划书及时上报到了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希望能够尽早开始工作。但事情没有像顾颉刚想象得那么简单,后竟拖沓以至于流产。

《拟印行〈十三经新疏〉缘起》是为国立编译馆编刊处编辑《十三经新疏》而做,文中叙述了《十三经》被确立为经典的历史渊源:“吾国文化发端绝早,史官纪载,合为六经。凡欲审识我先民缔造之历程与夫古今学术之根原者,粲然之蹟咸在乎是。昔在姬周,乐正教国子以四术,四术者《诗》《书》《礼》《乐》也。孔子雅言,《诗》《书》《礼》《乐》,包《礼》典,其事不异。盖礼、乐尚乎躬行,诗、书可以识古,四术修而人伦备焉。其后增以易、春秋,用寄其天人之际之崇高理想。至于汉代,而先圣之传记,经文之异说,古史之逸篇,经籍之训诂,悉归于《六艺》一略。后代商讨,实举其数为十三。”这十三经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经典,“二千年中,一切政治制度、道德思想无不由兹出发。故十三经者,吾国文化之核心也”。但其地位在近代却受到了冲击:“近世外患日亟,举国骇惊,丧其所守。自科举废而遂谬谓经学无与于人事,大师凋落,后学彷徨。苟由此道而不改,再历数十年,经学固沦胥以亡,我民族精神其能弗涣离其

^① 《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上游集》,第6页。

本耶!”^①在这里,顾颉刚把《十三经》看作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本,认为整理和刊印《十三经新疏》这项工作是在挽救和重整十三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其目的是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为新文化的建设提供依据。

“十三经”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荟萃,以此为中心的经学也居于传统学术之首。近代以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传统经学与时代的发展需要产生了矛盾。解决国家民族危亡问题需要强有力的物质和技术,而且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旧有的伦理道德被视为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所以,自20世纪初科举考试废除,特别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传统的思想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经学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由学习西方的技艺、政治制度,以及新的思想文化而形成的新政治文化制度和思维方式开始逐渐代替围绕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原有的制度和思维方式。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成为中心任务时,人们才更多地从民族文化的层面去思考,认识到民族精神之重要,反思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简单态度,意识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应源自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以此,由抗日战争所引起的民族复兴思想的高涨,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回顾和挖掘传统文化的机会,使他们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复兴应从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去寻根,开始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思想和主张的最终实践便是整理、出版传统的古籍文献,编辑出版中国传统古籍经典的代表“十三经”注释,显然是抗战时期重视传统文化的一个实际例子。

事实上,近代一些著名的新派学者对传统经典还是相当重视

^① 《拟印行“十三经新疏”缘起》,《上游集》,第4页。

的。顾颉刚回溯经学在近代的命运时提到梁启超、章太炎都曾有意整理《十三经》,“重订经疏之议,其所列举,差有同心”。所以,“结集《十三经新疏》之事同为数十年来公同之要求矣”。^①然而,战乱年代,整理工作有许多的不便。“天祸中国,东邻肆虐。抗战以还,东南文物之区,经籍版片多归一炬,自今以往,求之甚难”。但是古代的文献典籍不整理会消失得更快,只有因陋就简勉力而为:“不有汇刻,曷广流传;不由理董,曷资钻研;爰拟先集诸疏,以应一时需要,然后广求历代之校注考释,汇为经藏,析为长编,摘为辞书,制为读本,实事求是,延续经学无尽之脉。庶几远古文化得以彰明,民族精神于焉淬发,为建国大业之一助。”^②为此,他选列了一些经学家包括王先谦、皮锡瑞、孙诒让、廖平、刘师培、焦循等16人的17部经学著作,认为先把这些经学大家的注疏集起来,以备一时之用,待将来条件许可,再广泛地搜集,做更细致的校注考释整理工作。

顾颉刚重视经书,也重视其他古代文献的整理。1941年6月,他与国立编译馆商议编辑《唐以前文类编》事宜。编译馆答应由他来负责此项编辑工作。为此他作了《〈唐以前文类编〉旨趣书》,并向编译馆提交了《编辑〈唐以前文类编〉三十一年度工作报告》。

《旨趣书》肯定了清代学者在编辑前人文集、类书方面作了大量工作。鉴于唐代以降的材料太多,拟收录材料的范围“始于甲骨文,终于隋代”。顾颉刚主张承继近代学者“取精用弘,学术平等”的态度,“以科学门类分工合作”,以使旧籍古书的整理如“浚以至川,川以至江,江以至海”,“脉络贯通”。他说,自己“早岁即有志

① 《拟印行“十三经新疏”缘起》,《上游集》,第4至5页。

② 《拟印行“十三经新疏”缘起》,《上游集》,第5页。

于贯穿之学,甚欲写定群书,以类相从,分之为百家,合之为一帙,使论题相同者开卷而咸集,即便学者之寻检,且期其因同类材料之接近而激发若干新问题,俾古代学术之蕴藏无复沈掩”。^①为此,他还列举了20条编辑凡例,从选材、辑佚、考证、分类、编辑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顾颉刚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周密的计划,不料编译馆后将此工作收回自做。这样,顾颉刚整理古籍的第三个宏伟计划也未能实现。

整理古籍在抗日战争时期应当说是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致力于整理包括经籍在内的种种古代文献,是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至民族文化和学术发展在文献材料上提供一些直接的借鉴和帮助,所以对他来说,那只是为抗战胜利后文化和学术建设做准备。这表明了顾颉刚对抗战最终结局的乐观态度,以及对民族文化和学术建设的重视。尽管他的计划多没有结果,但由于他当时的学术地位,这些工作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3年开始,他转入了“史地通俗丛书”的编辑工作。

三

《上游集》涉及史学方面的文章有3篇:《〈史学季刊〉发刊词》、《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和《英文〈汉书·王莽传〉序》,对于研究历史的顾颉刚来说,似显太少,反映了他当时不能全力以赴研究古史的窘况。但这几篇文字反映了顾颉刚在史学整体建设方面的活动,主要是筹划建立“中国史学会”,探索史学普及的途径。

应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顾颉刚始终没有放弃对古史的

^① 《〈唐以前文类编〉旨趣书》,《上游集》,第7页。

研究和思考。他先后在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古代史、经学史、古史材料之种类及异同、史记研究、春秋战国史、历史地理等课程。除了教学和研究外,他还希望建立一个组织或协调史学研究的机构。

抗战时期随着大批学校和学者的西迁,西南诸省聚集了许多文化人,而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重镇。为了很好地利用这样一个机会促进史学的发展,1940年6月顾颉刚与蒙文通、萧一山、吕思勉、黄文弼、金毓黻等74位史学界同人发起创办了《史学季刊》,为创建国内第一个史学联合机构中国史学会开路。《〈史学季刊〉发刊词》即为此而作。

在《发刊词》中,顾颉刚谈到建立中国史学会的必要:“窃谓史学领域既随新观念而扩大,其方术又随新方法而精密,今日应担任之工作奚啻万千,应兴起之专家奚啻千百,应结合之团体奚啻百十,顾迄今尚不见有‘中国史学会’之产生,岂惟深憾,实为大耻。抗战以来,大学多迁西南诸境,加以旧有,其设置史学系者且十数。同人等夙具此怀,爰创斯刊以为‘中国史学会’之先声。”^①

建立中国史学会,就要把全国史学界的力量团结起来。顾颉刚等人结合创办《史学季刊》,就是希望能够有广阔的胸怀,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派见解,破除宗派畛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贡献。因而文中特别指出:本刊“所载诸文,考证不厌其详,观察不嫌其广,要当在有计划之下分工合作,期为新史学奠其基础”^②,表达了弥合分歧统一团结的良好心愿。

1941年7月,顾颉刚出席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又与缪凤林、金毓黻、黎东方联名提交了《由本会补助设立

① 《史学季刊发刊词》,《上游集》,第2页。

② 《史学季刊发刊词》,《上游集》,第2页。

中国史学会案》，为建立统一的史学组织继续努力。1943年3月23日，由教育部召集召开了中国史学会筹备会，24日顾颉刚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会议主席。成立中国史学会是顾颉刚等人的心愿，但当这个愿望实现之际，他却因“与今教长恶感已深，本不想参加，又恐其作强烈之打击而勉强出席”。^①后来事实证明，史学会所起的作用没有倡议者当初想象得那么大。

中国史学会的事情告一段落后，1943年春，顾颉刚再一次涉足出版界，发起成立“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致力于向民众普及历史知识及使史学著作通俗化。这是抗战时期顾颉刚的一项重要史学活动。

《上游集》收入的《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说：“抗战以还，同人懔于救国之大任，又目覩一般民众精神食粮之缺乏，与旧有读物之低级趣味所笼罩，无以振奋其心志而恢弘其度量，中心惻然，认为欲激起其爱国自爱之心，勉为国家民族之健全份子，其秉赋高厚者得蔚为社会之领导人才，事莫急于史地知识之宣扬，而三千年来之先正典型尤当及早化为普及之观感，以作见羹见墙之导引，因发起‘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以编辑《中国名人传》为第一事。”^②为见普及的功效，顾颉刚认为“丛书之读者对象为具有小学毕业以上程度之民众，并望供大中學生之浏览。体裁一律用语体文，务求生动有力”。^③

编辑《中国名人传》充分体现了顾颉刚重视学术普及的思想。早在抗战爆发之前，他就意识到通俗读物是学术和民众之间的有效联系方式。学术研究的结果，只有在民众中找到读者，才能真正

①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② 《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上游集》，第8页。

③ 《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上游集》，第9页。

地发挥其社会作用。1939 年 1 月顾颉刚就在《云南日报》上发表文章谈《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提出：通俗读物不是“一时的兴奋剂”，而是“早晚果腹的食粮”。要使民众成为健全的公民，则“公民所应有的知识全都要用文学的技巧灌输到不甚爱教育的民众心中，使得他们可以身体力行”。^① 他也曾身体力行撰写了通俗的《上古史》，并希望更多的人来做这普及的工作。他还说：“读者诸君如果觉得这个体裁可用，希望大家起来这样写，让一般没福享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能看我们的正史，激起他们爱护民族文化的热忱；那些大学生呢，也可看了我们的注释，自己去求史料，作深入的研究。”^②

顾颉刚从对中国民众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通过对《三国演义》、《杨家将》等小说在民间影响的了解，选择“名人传”作为普及历史知识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三国演义》、《杨家将》、《说岳》等小说使人们“稍具古往今来之知识，稍识古人忠义慷慨之情，有以自立自振，不至从风而靡”，在民众中起到了很积极的树立民族精神和意识的作用。他说：“童稚无不喜听故事，民众无不好观戏剧。闻奸佞用则脉张，见善人屈而泣下，盖仪型先民，嘉善瘅恶，出于天性也。以我国历史之久长，史料之丰博，与夫伟大人物之并肩而接踵，诚欲藉是以唤起民族精神，俾全体国民共赴至善之目标，同荷时代之责任，以完成民族复兴之盛业。其事本不为难，徒以历代史书，文字渊雅，非一般人所能习读，其学力足以读此高文典册者亦复无意下逮，俾一般人略稔其事而生钦敬之心，遂使国史上若干艰苦卓绝之人，磊落蹟奇之蹟，皆沉霾千古而无以

①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2 页。

②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2 页。

表祿于亿万国民之前，岂不重可惜哉！”^①

计划中的《中国名人传》丛书，“分政治、军事、学术、社会四方面，搜集重要人物，叙述其言行藉以激发民族思想，求中华民族之复兴”。其写作“应使一个时代或一地方之历史全貌藉某数人之思想行事而显现，且使传主不为孤立的人物；又当注意于传主之人格修养及成功之途径，使读者兴景仰爱慕之心”。“本丛书叙述，虽应尽是发挥传主美德，但不可作超人之描写，使人有不可企及之感；当竭力从平凡处下手，俾读者咸知‘人皆可为尧舜’求则得之舍则失之”。^②

顾颉刚并不是仅仅把《中国名人传》当作一种普通的通俗读物来计划的，他希望能够通过“名人传”丛书的编辑，最终为人们了解全部的中国通史作基础。因此，他定下通选原则：“自周迄清得二百余题”，“陶铸吾国族者列焉，创造吾文化者列焉，砥柱中流者列焉，济人刊物者列焉，期就此数百人之身而表现其各时代与各个社会之背景，析之为册，合之为一书，而《中国通史》之雏形于是乎在矣。一般虽未克读本国全史，而即此已握全史之灵珠，可以不负前人创业之艰辛矣。”^③也就是说，通俗的《中国名人传》并不是顾颉刚的最终目的，他在普及史学知识的同时，还在为专门的历史研究做准备，用《名人传》为《中国通史》作初期的预备工作。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学术计划是长远的，也是全面系统考虑的结果。1944年，顾颉刚还列出了编辑《中国通史》的计划，并进行了实际写作的设计，但由于抗战胜利后形势变化，计划并没有完成。

① 《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上游集》，第8页。

② 《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上游集》，第9页。

③ 《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上游集》，第9页。

四

边疆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学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顾颉刚关注的重点问题。《上游集》中收入了 3 篇关于边疆问题的文章:《中国边疆学会宣言》,《致边疆学会同人公函》,《请扩大并加紧边疆学术考察工作俾建国任务早日完成案》。还收了为有关边疆问题的书籍所作的序 4 篇和 1 篇纪念从事边疆工作而病逝的朋友的文字。

对于边疆问题,顾颉刚早在抗战之前就很关注。1934 年他曾见到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了解到边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及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当时办了《禹贡》半月刊,讨论边疆问题,也讨论民族史与文化史问题,连续出版了东北、蒙古、西北、西南、西藏、回教、回族、南洋等专号。还曾组织了绥远考察团,出版了《河套调查专号》。^①

抗战爆发以后,顾颉刚远赴西北甘肃、青海作了一年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西北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教育和民族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他写下了《西北考察日记》,并在《自传》中特别提到西北的发展和建设问题。与一般政客不同,顾颉刚从学者的视角出发,凭着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在考察过程中真正从当地民众的经济、文化教育角度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他认为,“从事边疆教育的人不曾把边疆文化作为他的工作出发点,所以处处见得隔膜”^②,要研究边疆问题就要深入调查研究。

正因为有西北考察的这样一个了解内地边疆的经历,在西南

① 参见刘俐娜编:《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4 页。

②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2 页。

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顾颉刚仍念念不忘边疆的建设和发展。1938年他到昆明后,在《益世报》上编了一个《边疆副刊》,讨论边疆和民族问题。办此刊的目的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①

1940年8月,顾颉刚与韩儒林等筹备“中国边疆学会”,次年3月由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4所大学共同发起正式成立,顾颉刚当选理事长。4月国民党社会部以重庆已有赵守钰等人办的同名学会,令其改名。后顾颉刚等人所办中国边疆学会与其他地方的几个同名学会联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中国边疆学会总会,陕西、四川设立分会。顾颉刚出任了“中国边疆学会”总会的副理事长。

顾颉刚如此热心于边疆学会的组织工作,是因为他认识到边疆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窃念开发边疆为今日之时代使命,此使命之完成虽迟早或殊,而要当于今日发其端绪,实为无疑之事实。”^②因而,他愿意为组织边疆学会努力工作。

1941年2月27日,顾颉刚在为新成立的边疆学会写的《中国边疆学会宣言》中,明确了学会建立的宗旨。他指出:“同人不敢避时代之使命,用自忘其鄙陋,成立本会,欲以认识边疆实际情况及其所蕴含之问题,共筹适宜之对策,唤起国人之注意。会中工作,纯为学术性质及社会事业,凡藉之以作政治活动者悬为厉禁,庶不至堕入政潮,丧其所守。故工作之类别有三:曰调查、曰研究、曰设

^① 《益世报·边疆(周刊)发刊词》,1938年12月19日。

^② 《致边疆学会同人公函》,《上游集》,第18页。

计,皆所以搜集材料,树立舆论,向社会作鼓吹,为中枢供拾补,对边胞施提携。期于若干年后,全国心理之中更无边疆内地之判分,亦无某种某族之区别,政府布统一之法令,国民享合作之安和;然后中国边疆仅为国境之界线,非复半壁之山河。是岂仅同人之大愿,吾国家民族之前途实利赖之。”^①

宣言中也指出,国家对边疆问题重视不够:“中国之为统一国家者二千余年矣,徒以治道相传,无为自化,不勤远略,始终未定一开发边疆之政策。”不仅如此,“或且利用边民之分散以削弱其力量,迫令彼此不相往来,而隔阂已深”。这就使边疆问题始终不能很好地得以解决。“近百年来,藩篱尽撤,异国之人狡焉思逞,辄为我造分化之口实,假自决之美名,以行其攘窃之毒计,而边疆问题乃日亟、内外不兢,至于今日,若犹一任他人之播弄而不自为奋发之谋,则唇揭而齿寒,其不同沦胥以亡者几希。”

宣言还特别强调指出边疆问题对中国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明确了边疆学会同人对国家的责任,并希望通过建立学会为国家解决边疆问题起到积极的作用。他说:“同人等具建国之热诚,懔当前之大任,爰揭策三义以告国人。一曰,民族团结当实现也……抗战目标在求复兴,欲求复兴必先求吾民族之整个团结,而团结之道则在打破内地与边疆之成见,群知在中华民国境界之内惟有一中华民族。”二曰,国防力量宜建立也。“三曰,富源开发应进展也。”^②他认为中国“求富强,求团结”,无不在于这三者。“求富强”,“求团结”也正是顾颉刚等人热衷于边疆问题研究的关键所在。由于顾颉刚等对边疆问题关注较早,也了解较深入,所以他们的宣言很能说明问题。

① 《中国边疆学会宣言》,《上游集》,第17页。

② 上述引文均见《中国边疆学会宣言》,《上游集》,第17页。

《请扩大并加紧边疆学术考察工作俾建国任务早日实现案》是顾颉刚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提交的提案。虽为参政会提案,内容却不乏学术意味,其中指出:“边疆各区地广人稀,蕴藏丰富,兼以国防所关,地方冲要,若不加以开发,使其于精神上物质上与东南省份打成一片,则国内之政治、经济、人口、社会以及国防等问题必将不能有完满之解决,建国任务亦必不能彻底完成。”他对边疆问题的解决与否看得很重,说以往政府重视不够、调查研究不多,“故情况殆如黑漆一团,不但内地人不之知,即当地土著亦未必能知之也。百年以来,列强宰割我边疆,发之于言论,形之于事实,迫使国人变更昔日之态度。”他要求把边疆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关系国家利益的重要工作来看待:“现在世界风云骤紧,我国国际地位因以日高,而边疆民众拥护中央之热念亦渐臻热烈,向来复杂之环境有简单化之可能,似应乘此时机,敦聘各项专家,筹足经费,组织考察团体,作有计划与系统之考察及独立自主之研究,限期进行,将探讨结果提供政府参考,俾建国工作早得完成,中华民族悉归团结。”^①在提案中,顾颉刚还详细地列出了具体办法:如由政府设立一规模较大之边疆研究机构统筹边疆的调查与研究事宜、考察的具体范围,以及考察的具体事宜等等。

从《上游集》中顾颉刚论及的边疆问题看,其认识较此前办《禹贡》时期有一定的变化。《禹贡》时期,研究的宗旨主要是为迫在眉睫的抗战提供一些历史的资源和帮助。研究的重点是“整理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地理沿革图、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整理历代地理志、辑录地理书籍中各种文化史料作各种专题研究等。那时提倡历史地理沿革的研究,主要目的是唤醒民族意识,动员人民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此时顾颉刚关注的重点则是通过对边疆史地

^① 《请扩大并加紧边疆学术考察工作俾建国任务早日实现案》,《上游集》,第18页。

的研究,特别是对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等现状的考察研究,为边疆的建设出谋划策,为建国服务。也就是说,他提倡的关注边疆问题的研究已超出了纯学术研究的界线,而是用学术考察的方法为国家建设提供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材料。并且在“学术考察工作外,对当地民众感情之联系及‘抗战纲领’之宣传均需努力将事,俾收促进国家团结之实效”。^①在经历了 5 年的抗战后,顾颉刚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强盛,民族精神的养成才是真正能够抵御外侮的最有效办法。而他通过对边疆,也就是中国西北、西南内地的了解,深刻地认识到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落后,中央与边疆等边远地区关系疏远都不利于中国增强国家实力的发展。因此,他积极呼吁,而且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请扩大并加紧边疆学术考察工作俾建国任务早日实现案”,希望边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能够为中央政府所重视。

顾颉刚的这项工作显然与他所坚持的纯学术研究性质不一样了,思路也由史地研究转变为历史与现状结合研究。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没有到西北、西南等地作实地考察,他是不会那么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何建设和发展边疆的具体看法的。抗日战争使顾颉刚走出了书斋,但他并没有失去学者的本色,在他的建议和主张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学者的严谨细致。

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在《责善半月刊》发刊词中就明确说到:“方今日敌寇凶残,中原荼毒。吾辈所居,离战场千里而遥,犹得度正常之生活,作文物之探讨。苟不晨昏督责,共赴至善之标,俾在将来建国之中得自

^① 《请扩大并加紧边疆学术考察工作俾建国任务早日实现案》,《上游集》,第 19 页。

献其儿微之力，不独无以对我将上，亦复何颜以向先人！”^①由抗战而来的责任感是顾颉刚心中不能忘怀的，这虽是他为鼓励战时的青年学生而讲的，实际也是对自己的激励。他正是带着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去工作的。在整理古籍、史学普及与通俗史学丛书和边疆问题等三项工作中都体现了其对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期盼。尽管这些工作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他顺应抗战时期民族复兴和文化建设需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尝试发展中国学术的努力却是值得后人敬佩的。

(作者刘俐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贵斋半月刊〉发刊词》，《上游集》，第3页。